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明代文学研究

名誉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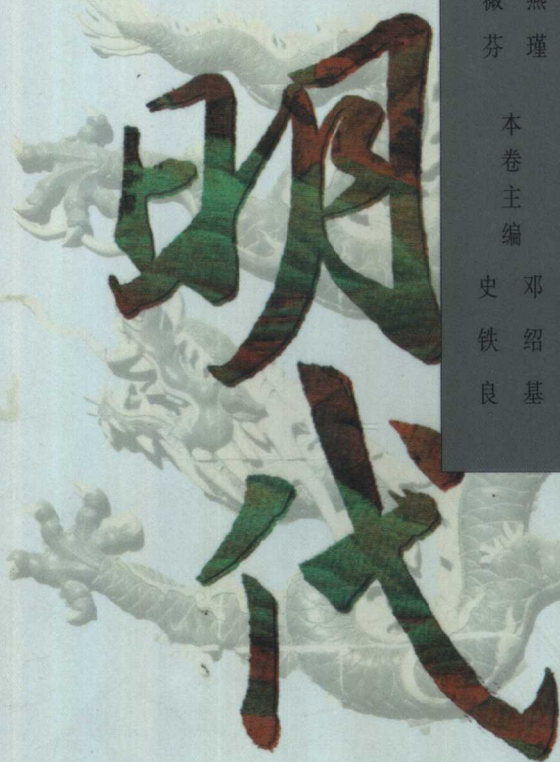
季羨林

主编

张燕瑾
吕薇芬

本卷主编

邓绍基
史铁良



北京出版社

I 206
39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明代文学研究

名誉主编
季羨林

主编
本卷主编

张燕瑾
吕薇芬
邓绍良
史铁良

撰著

史铁良
陈立人
邓绍秋

北京出版社



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



00194703

2063102

出版说明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是 20 世纪的中国学者对上古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总汇，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在世纪之交出版这套丛书，从历史的进程中确认规律性的成果，并进而为全球化格局中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由季羨林先生任名誉主编，张燕瑾、吕薇芬先生主编。丛书依据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分为 10 卷 12 分册。其中隋唐五代卷、宋代卷各分二册，约 100 万字。其余各卷均为一册，约 50 万字，丛书近 600 万字，相信有关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都已网罗无遗。

为了确保丛书的客观性、学术性、权威性，丛书主编及各卷主编、作者及全体编辑人员付出了数 years 艰苦的努力。丛书的编校大致遵循以下原则：

- 一、关于引文。在准确科学的原则下，引文尽可能保持原貌，除明显的文字讹误外一般不径作改动。
- 二、注释一般采用脚注。某些目今稀见的版本注明章节；个别成果总括性文字较为集中时，图书的版本或文章之出处可随文说明；引用次数较多的著作可以章为单位，在一章中首次出现时标注作者、书名、版本、页码等，再出现时则可简化处理。
- 三、规范用字与标点符号。一般原则应改异体字为正体

字，繁体字为简体字，但遇特殊情况可斟酌处理，譬如人名。标点符号的使用皆以 1996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为依据，对引文末尾的标点符号，则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以合情合理为原则。

四、数字使用。公元纪年统一用阿拉伯数字，每一朝代及干支纪年统一使用汉字，其他数字用法根据需要以行文流畅得体为原则酌情处理。

总之，本书编辑思路是：方便读者，保证质量，遵守规范，同时以科学、得体、合理为大原则。不妥之处，欢迎批评。

北京出版社文史编辑部

2001 年 12 月

序

季羡林

我们眼前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20 世纪的世纪末；再过三年，一个新世纪就要来临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各行各业都应当回顾一下，回顾过去九十多年中我们的所作所为。世人都知道“鉴往知今”的重要意义。鉴往决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知今”，而且两者都是为了预测未来，以便把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好。人类总得随时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嘛。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

而且眼前不仅是世纪末，而且是千纪末，其意义当然与一般的世纪末迥乎不同。世纪和千纪，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与大自然的年不同。没有耶稣，哪里来的世纪和千纪呢？可是一经创造出来，它们对人类的思维和行动就产生了影响，历史事实和眼前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无须赘述。

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包括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决不能例外，我们也要回顾一下，前瞻一下，预测一下。我们这一套《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就是回顾，回顾过去将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收获在哪里？成功之处在哪里？还有没有不足之处？如果讲成绩，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如果讲不足，又如何加以避免或弥补？总之，我们要回顾的问题多得很；但是，主要讲的是成就，因为成就确实是十分辉煌的。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鉴往为了知今，知今为

了预测未来。在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在那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中，我们主要应该做哪些事情？我们现在常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是，在中国文学中优秀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们在鉴往回顾时应该结合今天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弄个清楚，然后弘扬才有目标，才有根据。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至少有两件事可以弘扬，这都是中国文学中独特优秀之处：一个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一个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性。近二三百年来，自从西方兴起产业革命以后，西方文化主宰了世界，最显著的表现是在科技方面。西方思想的核心是“征服自然”。“征服”的结果是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衣、食、住、行四个方面都包括在里面。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否定的。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殃，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出洞，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爆炸，新病丛出，等等。所有这些弊端都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前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切不可等闲视之。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惟一的办法就是以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是要与大自然为友不要为敌的思想济西方“征服自然”的思想之穷。倘若真正付诸行动，人类庶几能有更加光明的未来。“天人合一”思想基本上属于哲学范畴，但是文学中也会包含着这种哲学思想的。因此，在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着重探讨这种思想，弘扬这种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东方其他国家也有；但以中国为最显著，最突出。可惜我们有时也没有做到，因此，即使是在中国，这种思想也必须大力弘扬，何况是对西方呢？当年鲁迅先生曾提倡过“拿来主义”，就是要把西方的好东西拿过来为我们所用。现在，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就是把中国的好东西送给西方，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好处，这是第一件好事情。第二件就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性，比如一些诗

句只有名词，没有动词，等等。美国诗人 Ezra Pound 曾试图模仿。这种艺术性，外国诗人和学者极难理解；但倘若介绍出去，也可能丰富西方创作的表现能力和艺术魅力。

我们在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可做的事情还很多，以上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希望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和外国的专家能共同努力，互相沟通，使中国文学研究在新的世纪大放异彩。是为序。

1997 年 4 月 4 日

第一章 绪 论

20 世纪明代文学研究，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900 年至 1917 年）

这一时期的社会和文化特点，实应追溯到 19 世纪的 90 年代。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当时的维新派于 1898 年发起变法运动，即戊戌变法。1905 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代表着革命派的壮大。所以，维新与革命是这一时期的大事。文学研究自是离不开时代因素的影响，所以这时的明代文学研究也受到维新和革命以及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认识到小说的巨大作用，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①一文中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所以，“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种观点反映了他希望用小说为维新服务的目的。就对小说的认识来看，扬弃了传统的视小说为“小道”的观点，实际上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康有为在《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②中说：“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康氏写此诗是为了催促菽园居士（邱炜菱）尽快写

① 载《新小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第 1 号。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 1936 年版，1989 年重印，第 2 册。

② 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 1960 年版，卷五。原载《清议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署名更生。

出反映戊戌政变的小说，却也反映出他重视小说影响力的观点。这时，更有维新派人借对明代小说的研究，张扬维新的目标。阿阁老人《说小说》^①“西游记”条称：“《西游记》者，中国旧小说界之哲理小说也。细观其自借炼石化身起点，以至远游异国，学道而归，恢复昔时一切权利。吾人苟能利用其前半段之所为，即可得今日出洋留学之效果，以精器械，以致富强，保种在是，保教亦在是。”“精器械”、“富强”、“保种”、“保教”正是当日维新派的口号。阿阁老人这段话，实属借题发挥，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研究，但其实用的目的很明显，即为变法图强服务，与康、梁的主张正相一致。邱炜菱《客云庐小说话》^②“穷愁著书”条说，“《水浒传》以慕自由著，《三国志》以振汉声著”，邱又在另一条中说，“《水浒传》得自由意境”。定一《小说丛话》^③认为：“忠君者，据乱之时代也；忠民者，大同之时代也。忠其君而不忠其民，又岂得谓之忠乎？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使后人倡其说者，可援《水浒》以为证，岂不谓之智乎？吾特悲此之不明斯义，污为大逆不道。噫！诚草泽之不若也。”《水浒》的中心不在追求自由、民主、民权，所谓自由、民主、民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三国演义》有人心思汉的表现，也并不是它的重点。这些研究者提出以上问题，在于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为反清、反专制张目，有明确的政治意图。王国维当年说：“观近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

① 载《月月小说》第6号，光绪丁未年（1907）二月。

② 见阿英《晚清小说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四。原载《新小说丛》第2、3期，清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

③ 载《新小说》第2年第3号（原第15号），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

价值，而惟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①当时的文学研究正与文学创作的特点基本一致。此外，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文化界掀起一个翻译西方文化著作，介绍并引进西方文化思想的新潮。在这种背景下，学人们相当重视方法论，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如梁启超、蔡元培等。而方法总与一定的观念相联系，在观念的指导下运用。自19世纪末严复翻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之后，进化论对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学研究均产生过深刻影响，“革命派用进化论的原理否定君主政体的合理性，论证民主政体的必然性”，认为推翻专制是“天演之公例”。^②文学研究者则以进化的观点阐释文学的发展变化，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以进化的观点说明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即是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学，就是一例。但这种文学上的进化观念要到五四文学革命发难时才大放光芒。而本阶段中推崇明代小说的观点，实际上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崇“平民文学”的观点相通。

第二时期（1917年至1949年）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正式举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旗帜的文学革命发生得更早，一般认为是在1917年。作为这个文学革命发难的重要标志的有两篇著名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③这两篇文章中都涉及到对明代文学的评价。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文学改良刍议》认为“言文合一”的趋势以元代最盛，可惜“为明代所

① 见《论近年之学术界》，载《教育世界》1906年139号。收入《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

② 见桑咸之、林翘翘《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页。

③ 《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

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他同时推崇“白话小说”，赞誉家喻户晓的《水浒传》《西游》是文学“正宗”。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认为“元明剧本”和“明清小说”是“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明代前后七子和归有光等人则是“妖魔辈”。稍后，胡适、周作人等又推崇明代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甚至认为是明季的“新文学运动”。

以上观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过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明代的小说、戏曲作为“平民文学”被空前地重视，诸多著名学者，对它们进行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其次，明代诗文（公安派除外）被长期忽视。

胡适身体力行，作小说研究，在明代作品方面，他写了《〈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三国志演义〉序》等。他对这几部明代文学巨著的成书、作者、演化等问题的研究，实开一代风气。他明白告诉人们，他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或形象地称之为“拿证据来”。这种方法影响了很多学人。胡适研究文学之所长，正在这里。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分析，则十分薄弱，甚至根本不涉及，所以，胡适研究明代小说的贡献，多在考证的层面，而不在思想艺术研究的层面。

胡适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本是和他尊奉的进化论观念相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水浒传〉考证》^①中最早提出“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但他所提供的例子却是浅近浮泛的，比如他说“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水浒传》”，这就是似是而非的浮泛说法。所以，胡适

① 见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水浒》卷首，收入《胡适文存》一集，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

实际的考证成绩超过他宣扬的方法。但在当时，这种方法确又发生过影响。

郑振铎是五四以后研究小说、戏曲的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他也尊奉“进化的观念”，或也受到胡适的影响。如他认为，“文学史上许多错误，自把进化论的观念引入到文学的研究上以后，不知更正了多少。达尔文的进化论，竟不意的会在基本上改革人类的种种错谬的思想。许多人都相信《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都是元朝人流传下来的。但是有了进化观念的人，却很怀疑，当那时，中国小说方才萌芽之时，乃竟会有那么完美的作品产生。……我们有了进化论的观念的帮助，便方可以大胆地改正一般文学史上把小说当作元人盛业的谬误了”。^① 郑振铎还谈到戏曲的进化，他认为，“元曲中，其结构、人物都甚简单，每剧只有四五出，每剧中只限一个人物歌唱，到了明人的传奇却大为进步；出数多至三十、四十，人物也多了不少，每个人物都可以歌唱，有时是合唱，有时是互接的唱，这使剧场热闹了许多，确是一个大进化”。从具体作品说，他举出唐朝白居易的《琵琶行》，变而为元朝马致远的《青衫泪》，再变而为明朝顾大典的《青衫记》，“愈变愈烦愈细”。“《青衫记》中，所写的事实却更曲折，描写也更深入了”。^② 小说、戏剧的演化与生物的进化有相似的一面，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但不能机械地运用，如果说用这种“进化”的观点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成书年代，明传奇体制的变化，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话，那么，也是一种进步。从《琵琶行》到《青衫记》，涉及改编问题，将诗

① 见《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载《中国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9、10页。

② 同注①。

改编为戏剧，肯定会变得“愈烦愈细”，但不一定能出蓝胜蓝。如以《青衫记》后出，就认定它胜过《琵琶行》，那就是庸俗进化论观点了。好在郑振铎是反对庸俗进化论的，他在同文中说过：“所谓‘进化’论者，本不完全是多进化而益上的意思，它乃是把事物的真相显示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时时随了环境之变异而在变动，有时是进化，有时也许是在退化。”后来，郑振铎又接受了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更发生了变化。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产物，他把被称为“子部”的小说和被视为“闲书”的白话小说打通起来，写成史著，是别开生面的，其间对明代小说的评价有卓越的见解。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①中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但从鲁迅著作的整体看，他的“进化”思想的核心是发展和变革的观点。

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之后，社会学批评方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批评方法着重从社会、时代、思潮，乃至阶级的广泛联系中，考察文学现象，而这正是考证学的方法所缺乏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后，社会学批评方法更为风行。它与唯物史观有接近的一面，后来在唯物史观指导之下的社会学批评方法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主宰。这时，一部分学者主张用唯物史观来审视文学现象，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1933年，郑振铎说：“至于那新的方法究竟是什么样的方法呢？当然各人的师授不同，不能执一而论。惟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的产生，不单只该赞颂那产生这作品的作家的天才，还应注意到这作品产生的时代与环境，换言

① 见《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附录。

之，必须更注意到其产生的社会因素。”^①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作者在这之前对以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研究文学的称赞，就可以看出研究方法的前进。当然，这里不是说此前的文学研究没有接触到时代的因素，如阿英就指出过：狄平子在1906年创设的《新小说·小说丛话》栏中，“有《金瓶梅》《水浒传》合论，以社会生活考察的态度作论点，在当时可谓极大胆新奇的看法”。^②但没有如郑振铎上文那样明确强调文学研究要结合“经济因素与时代背景”的。1933年，《读书杂志》“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特辑”中有李华卿《中国文学史轮廓引论》一文，该文谈到方法论时，便主张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文学史的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部关于明代文学史的著作，那就是宋佩韦的《明文学史》^③，著者结合时代因素分析明代诗文，他将明代诗文分为五个时期。他分析第一个时期的诗文，说明“末代和盛世，文学上的作风总是不相同的”。认为第二个时期是太平的时代，诗文趋于雍容平易。第三个时期已不是太平时代，雍容华贵的诗文已不为时代所许。第四个时期，政局已不安定，同时就是文学作风变迁多端的时期。第五个时期，社会剧烈变动，士大夫受了非常的刺激，发为诗歌，多慷慨激昂。南明时期，诗歌悲感凄婉。这种论说虽也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同时也显出受当时社会学批评方法影响的痕迹。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是一本旗帜鲜明地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编写文学史的著作，它强

① 见《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载1933年《文学》杂志“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收入《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② 见《小说闲谈·小说丛话论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③ 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版。

调“社会经济发展至某一阶段，则文学亦随之发展至某一阶段，社会经济停滞在某一阶段，则文学亦停滞在某一阶段”。这种强调虽然流于机械，但反映出社会学批评方法在中国运用的历史轨迹。在研究明代作品的文章中，也出现过一种生硬的做法，如刘毓松《水浒传的社会思想研究》^①一文，分析梁山义军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革命的政纲政策和坚强的政党领导。这如同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一样，以一般的、历史的、政治的分析取代了对《水浒传》这一独特的艺术作品的分析，表现出庸俗社会学的倾向。^②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明代文学研究，随着本时期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进展，也有明显的表现，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关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问题，它涉及的是中印文学的比较研究。胡适于1923年作《〈西游记〉考证》^③，他研究了印度古代神话故事《拉麻传》（即《罗摩衍那》），认为传中的神猴哈奴曼是孙行者的原型。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④支持胡适的论点。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⑤认为《贤愚经》的《顶生王缘品》和《罗摩延传》（即《罗摩衍那》）的猿猴故事，是《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故事之起源。比较研究至少可以拓宽学人的视野，将中国文学放到世界文学之林中去观察研究，说明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以

① 载《历史社会季刊》1947年3月第1卷第1期。

② 参看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篇》，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25页。

③ 见《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

④ 载《文学》1933年1卷4号。收入《何倭集》，生活书店1934年版；又见《郑振铎文集》（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⑤ 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二册二分册，1930年。收入郁龙余编《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及规律。

这一时期在明代文学的整理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标点本分段的章回小说，如亚东图书馆于1920年、1921年、1922年分别出版了汪原放标点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这实际上开了一种风气，起了很好的作用。

30年代，出版了两部明代文学的断代史，这两部明代文学史皆能成一家之言。一为钱基博的《明代文学》，1933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为“百科小丛书”之一。以论述传统诗文为主，另有一章谈明代的八股文。曲部分因吴梅另有专著，所以钱氏谈得比较简略。一为宋佩韦的《明文学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为“国学小丛书”之一。该书只谈诗文，作者在该书“引言”中交待：明代传奇与小说置之不论的原因是，“因为本丛中另有郑振铎先生的专篇论述，为避免重复，就将这一部分删去了”。该书也有一章专谈八股文。“引言”谓明代文坛的黯淡的空氣的造成，不能不归咎于八股文。因此，“在本书的末章，要特别把八股文作一个有系统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不约而同地都有八股文专章，不过，即使八股文中有极少数篇章带有文学色彩，但从总体看，它不属文学的范围，所以后来的文学史著作中都把八股文扬弃了。有关明代戏剧的专著，有卢前的《明清戏曲史》，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散曲专著则有任中敏《散曲概论》，1931年中华书局出版；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于其他有关明代文学的评论、考证文字，也相当的多，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百年来明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个丰收时期。

第三时期（1949年至1976年）

本时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已确立为全国各项工作、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也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指导思想，并是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上阶段风行一时的实证论与考据学

相结合的方法，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批胡适的政治运动中被当作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典型而遭否定。从西方传进来的其他研究方法，也常被忽视。我们从 30 年代出版的《文学百题》可以知道，那时介绍西方的批评方法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如观念论的批评，演绎的批评，归纳的批评，印象的批评，鉴赏的批评，审美的批评，心理学批评等等。到本时期，这些批评方法都已衰落乃至消失。只有考证的方法还很盛行，因为研究作者、探讨时代，都离不开材料的考订，任何社会学批评方法都是不能取代考证方法的。考证的方法可以为社会学批评服务。一般地说，社会学批评方法所长在评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政治倾向。它的视角较广，不是孤立地就作品论作品，就作家论作家。它具有理性分析的深刻性，对文学作品的意义和社会价值，能洞烛其微。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把社会学的文学批评发展到了高峰，而且它本身也已形成一个科学体系。所以，自 1949 年到 1966 年这十七年间，古典文学研究（包括明代文学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这十七年间的论著比三四十年代还要多。而这个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古典文学研究学术体系的初步建立，也就是说，这时候的研究家们通过他们的努力，在实际上创造和形成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明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冯雪峰的《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①，系统地论证了《水浒传》的主题——农民起义说。这在当时是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陈中凡发表在 1962 年第 4 期《文学评论》的《汤显祖〈牡丹亭〉简论》，根据晚明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以及

^① 载《文艺报》1954 年第 3—11 期。